



The Interchange of Information between Shanghai and Macao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Zhixin Bao*

Xiong Yuezhi

Abstract: The study on *Zhixin Bao* (*The Reformer China*) reveal that there is a frequent interchange of personnel and information between Shanghai and Macao since Shanghai was opened as a treaty port in 1843, although there is a long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cities, they share similar situations and styles, which means that they were both the frontier cities where the Chinese meet with the western culture. *Zhixin Bao* (*The Reformer China*), which was founded and published in Macao in 1897, was originated from *Shiwu Bao* (*Shanghai*) with similar staff, purpose and style. Its issue was based on the distribution channel of the *Shiwu Bao* and there was a branch of the *Zhixin Bao* in Shanghai, and it had kept close relation with Shanghai since then. It kept a watchful eye on the new trend and the activity of gentry in Shanghai; the gentry wrote the letter to Shanghai British Consul, in which they plead with the British to help the Guangxu Emperor come to power again and who had published their views on the royalist ideas and the political reform of China, and the adverse opinion of Jing Yuanshan on Empress Dowager Cixi's decision to designate crown prince in 1899. And it reported new trends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in Shanghai by publishing "Jingxingge (The Song of Alarm)" and "Shanghai wangshi yucai shushu zhangcheng (Articles of Shanghai Wang's Yucai Confucian Academy)". On the one hand, a lot of excerpts from the newspapers in Shanghai, such as *Zhongwai Ribao*, *Subao*, *North China Daily News* and so on, could be found in *Zhixin Bao*, which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inland in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the newspapers in Shanghai, such as *Jicheng Bao*, *Shenbao*, were very interested in the context of *Zhixin Bao*, so some excerpts from *Zhixin Bao* which were focused on the western culture centering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lso could be found in the Shanghai newspapers. So we can say that there is an interchange of information between Shanghai and Macao in late Qing period in perspective of the *Zhixin Bao*. Shanghai was represented on *Zhixin Bao* as a city that was under the strong influence of the west, but it also carried the characters of Chinese inland city, and meanwhile, Macao was represented in the Shanghai newspapers as the frontier, where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met, as the window through which the Chinese watched and comprehended the western culture, in which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included, so the newspapers in Shanghai were much more interested in the reports regarding the Chinese relation with the outside. Usually the circul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is oriented by the audience's interest and taste, so we can say that the interchange of the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Shanghai and Macao is initiated on account of their mutual interest and their similar style.

Keywords: *ZhixinBao* (*The Reformer China*) ; Shanghai; Macao; the interchange of Information

Author: Xiong Yuezhi graduated and obtained a master degree in History from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in Shanghai in 1981. After that, he worked in History Research Institute of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 had been working as the assistant dean of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director of History Research Institute. Currently, he is a member of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 is also a part-time doctoral supervisor of Fudan University, president of Shanghai Historical Society, vice president of Chinese history society. His representative publications include *Zhang Taiya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Democratic Thought*, *The Eastward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General History of Shanghai*, *Biography of Feng Quisen*, *Urban Culture Interwoven with Different Culture- Study on Social Life in Modern Shanghai*. He is chief editor of *The General History of Shanghai* (15 volumes).



從《知新報》看上海與澳門之間的信息走廊

熊月之



[摘要] 上海與澳門雖然相距遙遠，但自上海開埠以後，兩城市均處於中西文化交匯前沿，風格相近，氣味相投，人員交往、信息流動相當頻繁。《知新報》在澳門創辦、出版，但其辦刊人員、宗旨、風格，均脫胎於上海《時務報》，帶有濃重的上海文化氣息，其發行也是借用《時務報》原有網絡。《知新報》創辦伊始即在上海設立分館，是該報在澳門以外地方所設唯一分館，負責處理絕大部分來自內地的業務。《知新報》一直密切關注上海士紳的政治動態，發表上海士紳合呈上海英總領事稟，希望外國設法讓光緒皇帝重新執政；發表上海紳商關於保皇、變法的電文；發表因通電反對己亥立儲而避地澳門的經元善的言論；注意報道上海文化教育革新動態，發表《警醒歌》與《上海王氏育材書塾章程》；大量轉錄、摘錄《中外日報》《蘇報》《字林西報》等上海報刊的文章，轉載量遠多於其他地方，轉載內容以各國新聞、各省新聞、西方科技為多。上海的《集成報》《申報》等對於《知新報》也給予一定的關注，轉錄或評論《知新報》所刊多篇文章，內容多為西方科技信息方面。《知新報》與上海報刊形成一定的信息對流。在《知新報》報人那裏，上海既是凸顯洋化的城市，也是體現內地特點的城市；既是世界信息交匯之處，也是國內信息交匯之處，故其對於上海報刊的轉摘，國際、國內並重。在上海報人眼裏，澳門是中西文化交匯的前沿，《知新報》是瞭解包括科學技術在內的西方文化的視窗，故上海報刊對於《知新報》的興趣集中在對外聯繫方面。由於信息的產生與流動是有一定流向的，這一流向是由信息自身與信息接受主體之間的關聯度決定的，是受接受主體對信息的興趣、偏好制約的；因此，通過《知新報》的信息流動可以看出，當年的上海與澳門，是風格相近、互有興趣的城市，是人員對流、信息對流廣泛而頻繁的城市；於是，形成了這兩個城市之間的信息走廊。

[關鍵詞] 《知新報》 上海 澳門 信息走廊

[作者簡介] 熊月之，1981年在華東師範大學獲歷史學碩士學位，之後進入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曾任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歷史研究所所長，現為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兼任復旦大學暨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生導師、上海市歷史學會會長、中國史學會副會長，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章太炎》《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通史·總論》《馮桂芬評傳》《異質文化交織下的都市文化——近代上海社會生活研究》，主編有《上海通史》（十五卷）等。

兩個城市之間的關係，一如兩個人，有時候，物理距離很近，但心理距離很遠，咫尺天涯；有時候，物理距離很遠，但心理距離很近，天涯比鄰。上海與澳門，即屬後者。這兩個城市雖然相距遙遠，但自鴉片戰爭以後，隨着上海被開闢為通商口岸，西人來滬日多，西風拂滬日強，兩城市風格日益相近，氣味日益相投，其聯繫也日趨密切。從《知新報》的創辦與上海城市的關聯程度，《知新報》對於上海城市的關注，對於上海信息的重視與轉發，可以清晰地看出，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滬澳之間，已經構建起聯繫廣泛、快捷而密切的信息走廊。

一 《知新報》帶有濃重的上海文化氣息

《知新報》的辦刊人員、宗旨、風格，本脫胎於上海《時務報》。

《知新報》之創辦，創議出於康有為（1858—1927），藍圖出於梁啟超（1873—1929），經費、報務成於何廷光，其經理康廣仁（1867—1898），主筆梁啟超、徐勤（1873—1945）、劉楨麟等，撰述何樹齡（1868—1908）、麥孟華（1875—1915）、譯員康同薇（1878—1974）等，或是康有為弟子，或是其弟、其女，即使不是弟子、親屬，也是康有為思想的信奉者、追隨者。這些人中，有些人（如徐勤、康廣仁、何樹齡、麥孟華）原先就在上海生活過，參加過上海強學會、《時務報》、不羈足會、中國女學會的活動。《知新報》骨幹人物徐勤、何樹齡，1895年在上海任《強學報》筆政，《強學報》停辦後，二人又擔任過《時務報》筆政。他們到澳門辦理《知新報》，將其在上海的辦報經驗與風格沿襲下來，使得《知新報》成為《時務報》第二。誠如施欣所論：

（《知新報》）繼承和發揚《時務報》的理論特色和辦報風格。縱觀該報報章的格式、編排的體例、版面的設計等均延續《時務報》的風格與傳統，在政治立場和價值取向上基本上是《時務報》的“跟班”和“影子”，甚至是完全的“翻版”與“複印”，因其觸及民衆的思想深處、符合大眾的口味需求，收到了預期效果，並一度大放異彩，獲得讀者的喜愛與好評。翻閱和檢視《知新報》，我們不難看出《時務報》對其影響之大、作用之深。從某種意義上講，《知新報》就是另一個版本的《時務報》，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時務報》第二”。^①

就報刊出版而言，澳門的傳統比上海更為悠久。澳門在1822年就有《蜜蜂華報》出版，是學界公認的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份近代報紙，但因其為葡文，出版時間又短，僅歷時年餘，對華人社會影響甚為有限。就中文報刊而言，澳門第一份中文報刊是《鏡海叢報》，發行時間為1893年7月18日至1895年12月25日，共發行125號。此報雖然也有國內國際新聞，也有少量政論文章，也發行到上海、蘇州、杭州等地，對日後澳門中文報刊也有一定影響，但由於此報旨在溝通澳葡當局和澳門華人社會，發行地主要是廣東，特別是港澳地區，其影響依然比較有限。^②

就中文報刊而言，上海比澳門有更為豐沛的傳統。從1857年創辦的《六合叢談》、1861年創辦的《上海新報》、1868年創辦的《教會新報》（後改《萬國公報》），到1872年創刊的《申報》、1893年創辦的《新聞報》，其間還有江南製造局連續出版多年的《西國近事彙編》、傅蘭雅（J. Fryer, 1839—1928）主編的斷續出版多年的《格致彙編》等，這些在晚清中國都有重要影響，也使得上海成為晚清中國中文報刊之大本營。梁啟超在上海主編《時務報》時，就從上海報刊傳統中汲取了許多營養。在制訂《知新報》規劃時，他有意識地將上海傳統融化進去。他在《知新報敘例》中明言，上海的“《西國近事》《格致彙編》，惟彼二種，頗稱美善。雖匪語於大備，乃有助於多識”；《知新報》注重翻譯《西國近事》與國外格致新知，就是繼續上海此前的出版傳統。^③他在致汪康年（1860—1911）信中亦稱：澳報“一、多譯格致各書各報，以續《格

^① 施欣：“論維新派第二言論基地《知新報》的歷史意義與現實觀照”，《前沿》10（2015）。

^② 胡根：《澳門〈鏡海叢報〉研究》（廣州：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2）。

^③ 梁啟超：“知新報敘例”，《知新報》（影印本，澳門/上海：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第1冊，第4頁。

二〇一八年 第一期

致彙編》。二、多載京師各省近事，為《時務報》所不敢言者。三、報末附譯本年之《列國歲計政要》。其格式，一依《時務報》”^①。

就辦刊實踐而言，《知新報》的政論，如《地球大勢公論總序》（第2冊）、《萬國公政說》（第5—6冊）、《地球六大罪案考總序》（第9冊），所介紹國際知識，如《英國議院開議》（第1冊）、《法國厚兵防英》（第2冊）、《美國民主佈政》（第4冊）、《德國使臣回音》（第5冊），延續的是《萬國公報》《時務報》傳統；所譯介的科技知識，如《開墾種茶》（第1冊）、《蘿蔔之利》（第1冊）、《氣球探營》（第2冊）、《採金器用》（第2冊），延續的是《格致彙編》傳統；所譯《列國歲計政要》，延續的是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傳統，連書名也是沿用江南製造局連續使用多年的老名。《知新報》的發行網絡，包括各地派送點，就是借用《時務報》的原有網絡，由時務報館代理。^②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知新報》創辦伊始，即在上海設立分館，館址先在四馬路石路（今福州路福建路口）的時務報館內。其後凡四遷：先是遷往新馬路梅福里（今新閘路黃河路以東）；後因“嫌其地太僻”，仍遷回四馬路時務報館內，時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六月；^③四個月後，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又遷到大馬路泥城橋東第四家大同譯書局內；^④戊戌政變以後，分館再一次遷移。《知新報》告示，“上海本分館今已他徙”^⑤，但沒有注明所遷處所^⑥。《知新報》此後再無在上海設立分館的記錄，是否還有分館存在，待考。

上海分館的業務相當廣泛，除了收受報費，還要處理讀者來信。所聯繫範圍，覆蓋中國內地大部分地區。《知新報》告白揭明，本報業務聯繫，除了美洲、南洋、臺灣、兩廣之外，均寄交上海分館。^⑦《知新報》告白稱：“所有外埠及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兩湖、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雲貴等省來函及報費各事，祈徑交大馬路泥城橋本館分館可也。”^⑧如此廣的範圍，如此大的工作量，估計上海分館的辦事人員當不止一兩人。

《知新報》在澳門以外地方設立分館，獨此一家，別無他處，這凸顯了上海與澳門這兩個城市之間的特別關聯性。

二 密切關注上海士紳政治動態

《知新報》存世四年間，中國社會急劇動盪，列強侵凌紛至沓來，維新運動潮起潮落，高層政爭，社會衝突，叢集交錯，跌宕起伏。作為全國最大城市的上海，與這些矛盾、衝突、鬥爭、變局無事無關，有時就在漩渦中心，直接影響這些矛盾、衝突、鬥爭、變局的進程與結果。《知新報》本是這一變局過程中與上海城市有內在關聯的產物，因此，對於上海在這一變局中的動態、作用，予以持續的密切的關注。這以兩篇文章的刊載最為突出。

一是刊載《中國各省士民合呈上海英總領事稟》。

“戊戌政變”（1898年）以後，光緒皇帝權力被剝奪，維新志士或死或走，變法失敗，新政夭折。康有為等人到海外掀起保皇運動，其同夥在國內受政治環境限制，無法公開活動，祇好轉入地下鬥爭。上海有租界，情況有些特殊，所以，保皇派利用上海租界進行半公開鬥爭。1898年10月31日（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十七日），一些保皇派以“中國各省士民”名義，致書英國駐滬

① 梁啟超：“致汪康年”，《汪康年師友書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2冊，第1846頁。

② 對此，《知新報》各期告白均已載明。梁啟超在籌辦《知新報》，即與汪康年商量，表示“將來銷報，仍藉《時務報》為之代理”（梁啟超：“致汪康年”，《汪康年師友書札》，第2冊，第1846頁）。

③ “本館告白”，《知新報》，1897-07-20（光緒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④⑧ “本館告白”，《知新報》，1897-11-24（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

⑤ “本館告白”，《知新報》，1898-12-04（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⑥ 按情理推測，戊戌政變以後，《知新報》在上海仍有許多業務，《知新報》與上海衆多報館聯繫仍然很多，其分館似仍存在。相關人員也許為了避免政治迫害，故意隱去分館實際位址。實情究竟如何，待考。

⑦ “重訂明年寄售章程”，《知新報》，1897-12-24（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

總領事，請代為設法辦理，設法斥退慈禧太后，讓光緒皇帝重新執政。英國總領事以此事為中國內政，不肯干預。《中國各省士民合呈上海英總領事稟》在英文《字林西報》發表，上海《中外日報》將其譯成中文。這是公然反對慈禧太后（1835—1908）的宣言書，被清政府控制嚴密的內地報紙不敢轉載。但是，與上海政治地位類似的澳門，清政府政治權力難以完全控制，《知新報》將其全文轉載^①。儘管《知新報》注明是“錄上海《中外日報》”，但仔細比較《知新報》與《中外日報》所刊文字^②，發現《知新報》還是有三處重要改動：第一處是題目。《中外日報》原題為“譯中國各省士民呈上海英總領事稟”，《知新報》改為“中國各省士民合呈上海英總領事稟”，去了個“譯”字，加了個“合”字。第二處，在《中外日報》作“不圖權奸煽謀，太后老眊，幽禁皇上，慘戮忠臣”，《知新報》改為“不圖奸黨煽謀，太后老眊，幽禁皇上，慘戮忠臣”，將“權奸”改為“奸黨”。第三處，原譯為“乞貴國斥退之太后，保護皇上”，《知新報》改為“乞貴國勸令太后歸政，保護皇上”，將“斥退”改為“勸令”，另加“歸政”二字。三處改動雖屬細微，但語義有所差異，對慈禧太后的憎惡之意更為強化，對英國人的請求更為委婉。這說明，《知新報》在轉載時確實是用心的。

二是刊載《滬上紳商電達各國文》。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6月27日，正值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已經打響，北方戰事正在進行，列強在北京的使館區正遭圍攻，以上海為中心的“東南互保”正在緊鑼密鼓地謀劃，上海領事團應聯軍大沽方面司令官的請求，剛剛在上海發佈旨在消除中國民眾對瓜分疑慮的《大沽宣言》（6月23日），《知新報》發表了《滬上紳商電達各國文》。這是義和團運動期間以“滬上紳商”名義表達政見的重要文獻。

文稱：“京中禍變亟亟，西兵大至，議瓜分中國。上海紳商大震，連夜集議，為文電止各國政府，請求皇上復政。”文中提出四點意見：（1）遷都。利用各國有兵在京的機會，保護光緒皇帝出宮，遷都南京或武昌或上海。各國亦應彼此會同，佈告天下，以目下悉已合力保護中國，請光緒皇帝臨御，治理萬機。（2）變政。京中所有六部衙門則悉予裁撤，另由新黨中簡選能員，以充執政大臣；並於新都內設客卿，其餘各處則概簡良吏以治理之，總以振興新政為務。京中大軍亦須盡行遣撤，另再招募精壯，由西人教習洋操，練成勁旅，或添派炮艇以保各處水路。（3）聘請西人襄治中國。中國海關、郵政、電報等局，請西人暫為管理，以華人之妥當者襄理其事，並設立通行銀錢及更改稅則等章程。另設專部辦理中西交涉之事，其管理專部則亦須派有洋員。

（4）開放。中國各處均仿照日本開作商埠。所有各國人之來中國者，無論何處悉准任意居住，遊行亦聽其便。傳教則無論中西教士一概予以保護。文章認為，由光緒皇帝以“其命維新”等語昭告宇內，如此“則衆民心治，目下之亂可不動而自平，中興之象亦可計日以待矣”。光緒皇帝“力雖微薄，而辦理新政之心則甚深切，即通中國民人，亦均有維新之意。故此時中國正應易為臻於郅治之時，至若民心思亂，實由舊黨中人固執偏見所釀成，並非故欲為之也”。文章堅決反對列強“瓜分中國”之議，認為各國如欲瓜分中國，必然遭致災難性後果，因為“中國此時人民數百萬中，有學問者雖少從事戎行，亦無所用，而其心則最為固執。一旦而忽有西人管理，其心定必不服，阻撓之事亦必層出不已。至欲以兵力瓜分，固非難事，祇須有兵萬人，即可成就。僅得中國，而欲伏中國人民之心，則非歷數百年工夫，斷難有成。禍難之事，更將不知凡幾矣”^③。

電文表達的是當時康有為等保皇派相當普遍的觀點。文稱，這些想法是上海紳商“連夜集議”的集體意見，而主議者是前翰林學士文廷式（1856—1904）。究竟哪些“上海紳商”參加集議，不得而知，不過，文廷式其時確在上海，這些主張也都符合他的思想。

^① “中國各省士民合呈上海英總領事稟”，《知新報》，1898-12-13（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一日）。

^② “譯中國各省士民呈上海英總領事稟”，《中外日報》，1898-11-26（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十三日）。

^③ “滬上紳商電達各國文”，《知新報》，1900-06-27（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一日）。

《知新報》關注上海士紳政治動態，最典型事件，莫過於對於經元善命運的關注。

經元善（1840—1903）是晚清上海著名士紳，長期從事慈善、教育事業與洋務企業管理，與康有為、梁啟超等相友善，1900年初因領銜通電反對慈禧太后廢帝立儲，遭通緝而從上海亡命澳門，於是與澳門有了直接關聯。經元善本為浙江人，長期在上海工作、生活，與澳門素無瓜葛。他之所以會逃往澳門，關鍵是其好友、同在上海工作生活的澳門人鄭觀應（1842—1922）代為牽線搭橋，並派人將其護送到香港，轉至澳門。因清廷嚴令通緝，經元善被葡萄牙官府拘留澳門大炮臺內，既不執行清政府引渡要求，也不給其自由活動的權利。

經元善的政治主張與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並不完全相同，但他領銜通電反對廢帝立儲的壯舉，舉世矚目，起了保皇派中任何人都無法起到的作用。正因如此，他成了名滿天下的大英雄。他被葡澳當局拘捕以後，海內外人士均設法營救，“滬、港各埠，中外紳商、教士、報館，得信後咸抱義憤，力主公論，並致函電於葡衙者，紛至遼來”^①。澳門甚至有人槍擊前來交涉引渡經元善的清廷使臣。其時，負責處理經元善案的最高地方長官是兩廣總督李鴻章（1823—1901），經元善於是給李鴻章寫了封兩千多字的長信，發表在《知新報》上。信中回顧自己與李鴻章交往的歷史，敘述自己對於時局的看法，奉勸李鴻章理解維新志士愛國苦衷，並速解黨禁，釋放廣東的已被拿獲的維新志士親屬。^②

此信是寄給李鴻章個人的，但是，《知新報》將其公之於世，這就成了公開宣傳的政治主張。同時，《知新報》也以這種方式向海內外關注經元善的人士，披露經元善一切安好的信息。

經元善利用在澳比較清閑的機會，將自己以往論著整理為《居易初集》出版。關注其命運的上海文化人，將其中相關內容摘錄出來，以《經太守元善挽救中國本原迂言》之題^③，在《新聞報》上發表出來。這也是當時滬澳兩地信息對流的表現。^④

此外，當年王韜（1828—1897）遭清政府通緝，從上海逃到了香港；此前，康有為遭通緝，經由上海逃到了香港，然後避地國外。這次，經元善遭通緝，也是從上海逃到香港，然後到了澳門。說來也巧，這三人都在避過風頭以後，又回到了上海（註：經元善於1902年經由香港返回上海）。由此三人出逃一回歸的線路，不難看出，晚清上海與港澳，因城市在政治安全性方面有類似之處，港澳較上海離政治中心更遠，更有縫隙可鑽，所以，持不同政見者在遇到麻煩以後，都有效地利用了這道縫隙，得以活命。

三 報道上海經濟文化發展動態

《知新報》對於上海的經濟文化發展動態，一直予以高度關注，時常報道、譯介有關上海的經濟文化信息。

（一）對上海經貿信息的關注

《知新報》相當注意報道或轉載有關上海實業動態、貿易信息。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翻譯、連載了香港英文書籍《東方商埠述要》。此書是《知新報》譯載時間最長、分量最大的英文著作。^⑤所謂“東方商埠”，指中國通商口岸。此書系統介紹了上海、廣州、香港、澳門等口岸城市的情況，包括歷史與疆域沿革、戶口、官制、賦用、貿易、街道、衙署、行店大小、風俗習慣等，內容相當翔實，屬城市指南之類，“讀之無異親閱其境，雖家人子自道其家事，無斯備也”。^⑥此書所介紹東方商埠，第一家便是上海，篇幅最大的也是上海，自第20期至25期，連載的全是關於上海的

① 經元善：“答原口聞一君問”，《經元善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第342頁。

② “經太守上李傅相書”，《知新報》，1900-08-25（光緒二十六年八月一日）。

③ “經太守元善挽救中國本原迂言”，《新聞報》，1901-11-04。

④ 《知新報》在1898年第54期發表過一篇《上海某太守與某先生論保險書》，沒有註明“上海某太守”真實身份，考文中所述這位“太守”在上海正忙於辦理公濟堂與女學堂事宜，與經元善經歷一一吻合，則此人似為經元善。

⑤ 周靈生譯：“東方商埠述要”，《知新報》第20-27、29-31、39-42期連載，凡15期。

⑥ 周靈生譯：“東方商埠述要”，《知新報》，第20冊。

內容。值得指出的是，書中所述關於上海的歷史知識，多是沿襲此前寓居在上海的英國漢學家麥都思（W. H. Medhurst, 1796—1857）等所述資料，有些並不準確。比如，書中稱，上海歷史悠久，“上海之名已立於秦漢之間，當時謂之海上”；事實上，“上海”之名到宋代纔出現。書中還稱：“聞說西漢以前，棉紗工務甚盛，一望平原，地土肥美。”這也不符合歷史，上海史籍中從無此類文字。有些地名的翻譯，也不符合當時的習慣用語。例如，將徐家匯譯為“西家園”，將虹口譯為“虹桥縣”。^①書中稱，上海租界“前為蘇州江，後倚護城河，如在小島中”。這裏的“蘇州江”顯係“蘇州河”之誤。不過，這些史實錯訛與名稱誤譯，倒折射了當時外國人與港澳人對上海城市的一些想象性因素。這些史實錯訛，都是朝着同一個方向的，即對上海有所美化。將“Soochow Creek”譯為“蘇州江”，按譯名遵從本地習慣的原則，倒是正譯。因為水流大者，中國南方稱“江”，北方稱“河”，故有“長江”“珠江”而無長河、珠河，有“黃河”“海河”，而無黃江、海江。這說明，譯者周靈生此前沒有在上海生活的經歷，也不大瞭解上海。

（二）對上海文化教育動態的報道

《知新報》對上海文化教育革新的報道，以刊載《警醒歌》、發佈《上海王氏育材書塾章程》最為顯明。

1897年，盛宣懷（1844—1916）在上海創辦南洋公學，聘張煥綸（1846—1904）為首任總教習，主持學校教務。張煥綸，字經甫，上海人，晚清上海著名教育家、學者。張煥綸受聘後，鑒於新式教育缺乏師資，決定先辦師範班，招生四十人，培訓後留校作為教師。他注意對這些未來的教師進行愛國教育，親作《警醒歌》，以為勉勵。歌凡四章，以愛國為宗旨，以種族滅亡為警告，以奮發、勤奮、惜時相勉勵。每章皆以“警”字開頭，以“醒”字結尾。全文如下：

首章，言黃種之可危庶幾懼而思奮也

警警警，黑種奴，紅種爐，黃種酣眠鼾未竟。毋倚冰作山，弗飲耽作醞，剝膚吸髓髓幾何，八百兆人，瞽眼同一穿。醒醒醒。

二章，言愚柔之可恥庶幾愧而思奮也

警警警，胚羲軒，乳孔孟，神明搖落今何剩？碧眼紅鬚彷彿流風韻。不恥為之奴，轉恥相師證，漫漫萬古如長暝。醒醒醒。

三章，言責任之不可貸庶幾勤學勤誨也

警警警，野吞聲，朝飲恨，百年養士期何稱，毋謂藐藐躬，隻手擎天臂一振。毋謂藐藐童，桃李成陰眼一瞬。自覺覺人，不任將誰任！拔劍倚天，幾輩空高論。醒醒醒。

四章，言韶光之不可再，庶幾急所當務，勿驚歧途也

警警警，水東流，日西軋，朱顏彈指成雙鬢。策駑馬，追八駿，九達之衢苦不迅，矧乃
縋藤繫迂徑，玩物愒時，買櫟珠誰問？醒醒醒。^②

《知新報》發表此歌，加編者按，對張煥綸及此歌予以高度評價，稱：“此歌為上海總師範學堂總教習張君經甫所撰，以教師範生者，深識大勢，用意甚苦。使其遍教國人，深入人心，皆知危急，發憤強毅，兼日而成，人才何患不成，種類何患不保？張君誠可為師也。”

此歌由師範班學生張惕銘、沈慶鴻等譜曲，每月的朔、望日，張煥綸率學生向孔子（前551—前479）牌位行禮之後，同聲齊唱，和以簫管，一派莊嚴肅穆氣氛。此歌在當時上海頗有影響，不但南洋公學學生唱，“校以外亦多傳誦”。^③

《警醒歌》是通過什麼途徑為《知新報》編輯所悉並刊載的，沒有確切史料記載。1923年，

^① 《知新報》第23冊對此有更正。

^② 張經甫“警醒歌”，《知新報》，1897年第25期。

^③ 沈恩孚：《張煥綸先生傳略》，《中華教育界》，第24卷第10期。

《申報》重刊此歌，稱此歌係梁啓超將其刊載於《知新報》的。^①

刊載《警醒歌》之後不久，《知新報》又刊載《上海王氏育材書塾章程》。

1896年，上海開明士紳王柳生利用縣城內王氏家祠之餘屋，創辦王氏育材書塾（今上海南洋中學前身），並制訂了具體章程。這是近代上海民間創辦的第一所中學性質的新式學校，不但在上海，在全國也獨步一時。書塾所設課程，有經史、詞章、算學，還有化學、英文等。尤為與衆不同的是，此校特別重視體育，專設體操課程，認為體育於健康、於社會有諸多益處。學校聘請上海約翰書院（後改名聖約翰大學）畢業的學生胡可莊等擔任教習，學校一切教法次序，悉照約翰書院。學校章程與管理制度，諸如課程設置（富國策、形學、三角學、天文、化學考質、電學、地學、譯文件、辯學之類）、作息制度、分級制度，無不從西式學校搬來。對於這樣的新式學校，《知新報》率先予以介紹，分兩期共六頁版面，完整地刊載了包括辦學宗旨、教學名單與分工、詳細課程表在內的《上海王氏育材書塾章程》。^②上海當時已是在全國領風氣之先的城市，但是，對於這所新式學校的介紹，卻被《知新報》獨著先鞭。

《上海王氏育材書塾章程》是通過何種途徑為《知新報》所知並刊載的，史料亦無具體記載。不過，從當時相關人脈來看，很可能如《警醒歌》一樣，是由張煥綸交給梁啓超，然後在《知新報》上發表的。王氏育材書塾開辦以後，張煥綸即被聘為總提調即校長^③。他那時身兼南洋公學教務長與王氏育材書塾校長兩職，將這兩所學校相關的文獻一同交由密切關注教育革新的《知新報》發表，比較合乎情理。再者，其時康有為、梁啓超等，對張煥綸的才學與為人相當器重。此前，康有為在考慮在上海辦理《強學報》人選時，就推薦了張煥綸。他在致何樹齡（1868—1908）等人信中稱：“張經甫亦佳絕……張經甫原我所舉，其人篤實，與蓮珊至交，在城裏梅溪書院。”^④

與上海教育文化相關聯，《知新報》第25冊介紹了上海江南製造局譯書動向兩則信息：

上海製造局近得蔣少穆太守國鈞為會辦，一切局事，大加整頓。聞最注意於譯書一事，頃擬將舊譯未刻之書，盡行刻出流佈，且別請通人校印，不必駐局，專選佳書，譯成郵寄，論字之多寡，譯書之難易，酌給薪水云。

頃傅君蘭雅已由英回華，盛杏蓀太常擬聘為師範學堂總教習，而製造局諸公，倚仗方殷，未肯放去。傅又薦一美人自代，且謂其學不亞於己云。^⑤

以上這些信息，《知新報》均為首發，而非轉載。19世紀末的上海，是全國報刊最多的城市，也是中國新聞傳播中心，這些信息，都是宣傳革新、開闢教育新氣象的極好素材，這類信息不是由上海本地的《申報》《新聞報》等報紙首發，而是由本部設在澳門的《知新報》發佈，既反映了《知新報》對這方面信息的敏感^⑥，也說明了《知新報》在上海的分部人員，與上海文化界有廣泛而密切的聯繫。

四 城市特性與信息對流

戊戌政變以後，《知新報》在上海分館不復存在（至少不再公開活動），報館編輯直接探訪、翻譯的稿件，也不如先前為多。於是，大量轉錄、摘錄國內各地報刊文章，成為1899—1900年《知新報》的重要特點。上海是當時中國報刊集聚地，《知新報》轉錄、摘錄上海報刊信息，也就遠多於其他地方。

^① “警醒歌”，《申報》，1923-12-22，第8版。

^② 《上海王氏育材書塾章程》，刊於《知新報》第29、30冊，光緒二十三年八月初一日、十一日。

^③ 《上海王氏育材書塾章程》稱：鑑於本學塾來學者日衆，“今商請師範學堂總教習張經甫先生，提調本塾事宜”。

^④ 康有為：“致何樹齡、徐勤書”，《康有為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第2集，第100頁。

^⑤ “風氣大開二則”，《知新報》，1897年第25期。

^⑥ 《知新報》對此類信息的敏感，還表現在其刊載紹興等許多地方教育革新的信息。

任何轉錄、摘錄都不是信手拈來、無所主張，轉摘什麼、如何轉摘的背後，都有轉摘主體的興趣、偏好、主張在起作用。分析一下《知新報》對上海及其他地方報刊轉摘情況，可以大致地看出轉摘主體與轉摘對象所在城市的文化差異。

1898—1900年，《知新報》轉摘上海報刊信息五篇以上的凡八家，即《中外日報》《同文滬報》《蘇報》《采風報》《字林西報》《新聞報》《同文消閑報》《遊戲報》。由於這些報刊創辦時間、創辦主體、創辦背景、辦刊風格各不相同，《知新報》對它們內容的轉摘也各有側重（參見表一）。

表一 《知新報》轉錄、摘錄上海報刊信息數量統計

序號	報名	則數	刊登期次	備註
1	中外日報	187	1—127	1898—1900年，172篇；其中9篇含多則。
2	同文滬報	64	113—125	1900年，61篇；其中2篇含多則。
3	蘇報	59	112—127	1900年
4	字林西報	40	112—125	1900年，36篇；其中1篇含4則。
5	采風報	37	115—125	1900年，36篇；其中1篇含2則
6	同文消閑報	25	119—126	1900年，19篇。
7	新聞報	21	115—125	1900年
8	遊戲報	8	115—125	1900年
累計		441		408篇

資料來源：《知新報》（影印本）。

從表一的統計中可以看出，就轉摘量而言，《知新報》自《中外日報》轉摘最多，172篇、187則信息（有時一篇多則）。其中，各國新聞19篇20則，各省新聞64篇71則；京師與朝廷新聞36篇、39則；外洋各埠2則，中外交涉44篇48則；論說4則。《中外日報》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8月17日創刊，前身為《時務日報》，以介紹中外大事、評論時政為重要特色，這與《知新報》宗旨吻合。《知新報》在缺乏第一手稿源的情況下，較多轉摘《中外日報》之各國新聞、各省新聞，既可補己之短，又可保持特色。

《知新報》對於《同文滬報》內容的轉錄、摘錄量，僅次於《中外日報》，凡61篇64則（見附表3）。其中，各省新聞30篇31則，京師新聞與朝廷新聞19篇21則，中外交涉與外洋各埠12篇。《同文滬報》前身是清光緒七年（1882）在上海創刊的《滬報》，本是英資《字林西報》的中文版，故創刊不久改名《字林滬報》，1900年初售予日人組織的東亞同文會，易名《同文滬報》。《知新報》轉摘時一作“《滬報》”或“《同文滬報》”。此報有日本背景，所載與日本有關信息較他報為多，故《知新報》對此報信息轉摘較多，亦可補其日本信息不足之憾。《中日紳商大會》《神戶至天津運貨腳費》《滿俄啓釁》《滿洲中俄戰務續述》等信息，均能體現《同文滬報》日本背景特色。

《知新報》轉錄、摘錄《蘇報》信息59則，全部集中在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就內容言，最多的是各省新聞，32則；其次是京師新聞，16則；中外交涉6篇；論說5篇。《蘇報》於清

光緒二十二年（1896）創刊，胡璋（1848—1899）主辦，由其日籍妻子生駒悅出面，向日本駐滬總領事館註冊，託名為日商報紙，以鄒弢（1850—1931）任主筆，1900年由陳範（1860—1913）接辦。上海當時屬江蘇省，《蘇報》對江蘇事宜格外關注，《知新報》轉摘《蘇報》信息中，關於各省信息居首，各省信息中又以江蘇、上海信息為多。江蘇、上海不光是當時中國最為發達地區之一，而且為“東南互保”之中心區域，故《知新報》轉摘《蘇報》信息頗多。《蘇絲減價》《江督吃苦》《中西會議保衛上海租界》等新聞，均是關於江蘇、上海事宜。

《知新報》轉錄、摘錄《字林西報》信息37篇40則，其中各省新聞11篇14則，中外交涉12則，各國新聞9則，京師新聞5則。《字林西報》是當時上海、也是當時中國發行最久、影響最大的英文報紙，信息來源廣泛而快捷，對中外關係尤為關注。《知新報》轉摘其信息中，以各國新聞與中外交涉最為突出。這體現了《知新報》通過多轉《字林西報》國際新聞以充實其國際性的特點。

《知新報》轉摘《新聞報》信息21則，其中15則是各省新聞，京師新聞3則，中外交涉新聞3則。《新聞報》是當時上海影響僅次於《申報》的以商業信息為主的報紙。

《知新報》轉摘《采風報》信息36篇37則、《同文消閑報》信息19篇25則、《遊戲報》信息8則。三報都是當時上海著名娛樂性小報，《知新報》所轉，亦多譏刺、諺諧、輕鬆文字，如《顛倒男女》《寧吃屎不願變法》《諱莫如深》《西人妙語》等。當然，即使是諺諧文字，也包含嚴肅的內容。例如，轉載《采風報》的《一心向日》，就反映強烈的保皇思想。其文曰：

孟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旨哉，大賢之言，誠萬古不易之論也。去臘立嗣之耗，傳之滬上，宛如霹靂一聲，由青天而降，一時紳商士庶，莫不驚惶失措，於此足見我皇上聖德及人之深。前日下午陰雨迷濛之際，忽有一人在黃浦灘向東而立，大哭狂號，遍體沾濡，淋漓盡致。聆之，則曰：“民有二王矣，何天無二日乎？”且哭且喊，迄不少休。一時觀者遂為之塞。有滑稽聞而笑曰：“今日大雨如注，果果者陰翳所蔽，此正暗無天日之時也，求一而不可見，遑論其二哉！且時已下午，日即出，亦當在西天矣，今君東向而望，是背時也，其可得乎？”其人乃喟然歎曰：“我亦知日為陰翳所蔽，惟血性未泯，不過一心向日而已”。聞者群笑其癡，而識者謂頗談微中也。^①

值得注意的是，《知新報》對上海最為著名的《申報》，似不怎麼感興趣，祇轉載過一篇，是中外關於議築船塢的交涉信息。考其原因，很可能是《申報》傳佈極廣，《知新報》沒有轉錄之必要。對同樣十分著名的《萬國公報》，《知新報》連一篇也沒有轉載過。當然，《知新報》對於《時務報》的信息，也沒有轉摘過。同一系統，同一發行網絡，相得益彰，自無轉摘必要。

上海報紙對於《知新報》也給予一定的關注。其中，文摘性的《集成報》^②，在1897—1898年，共轉載過《知新報》信息73則，其內容大多是《知新報》所載西方科學技術進展情況，比如，《礦學新法》（1897-6）、《養蠶學校》（1897-6）、《彈子新制》（1897-3），都是《知新報》譯自外文報刊的內容；《擬造菱船（指三角形船底——引者）》（1897-6），則是摘錄《知新報》所譯德國報紙關於中國紡織業的評論（1897-17）。

從信息傳遞的另外一個方向看，《申報》對《知新報》所刊文章也有所關注與反應。筆者利用《申報》電子版檢索系統，查得《申報》自1897年4月14日至1898年3月28日，共有十四篇文章述及《知新報》的信息。其中，十三篇是轉述、摘錄《知新報》所翻譯的歐美及日本報刊的信息，或為政治動態，或為科學技術；一篇是就《知新報》所載關於中國未能在仰光設立領事的信

^① “一心向日”，《知新報》，1900年第115期。

^② 《集成報》，1897年5月6日由陳念劬在上海創辦，為近代中國第一份文摘性刊物，旬刊。內容分政事、軍事、礦事、農事、商事、工事、雜事和各國各類電訊。後又增譯論節要、日文和法文報摘，多摘錄以宣傳維新變法為主的報刊。1898年5月5日出第34冊後停刊。

息而發表的評論，沒有一則是關於中國內地事務的。由此可見，《申報》對《知新報》所感興趣的信息，全部是中國以外的事務或與中國外交有關的事務。通過《知新報》這個視窗可以看出，就上海與澳門信息對流而言，上海處於信息出超地位，澳門處於信息入超一端。

在《知新報》報人那裏，上海既是凸顯洋化的城市，也是體現內地特點的城市，既是世界信息交匯之處，也是國內信息交匯之處，故其對於上海報刊的轉摘，國際、國內並重。

在上海報人眼裏，澳門是中西文化交匯的前沿，《知新報》是瞭解包括科學技術在內的西方文化的視窗，所以，無論是《集成報》對於《知新報》信息的興趣，《申報》對於《知新報》關注的焦點，都與西方或中外交往有關，故所轉摘、所關注的信息多在那一方面，而對《知新報》所刊國內信息，興趣不大。

與滬澳信息對流可以做一比較的是，澳門與長沙的信息對流。《知新報》共轉摘《湘報》《湘學新報》1則，《湘報》《湘學新報》轉錄《知新報》信息23則。顯然，澳門與長沙的信息對流中，澳門明顯處於信息出超地位，長沙則處於信息入超地位。

信息的產生與流動，並不像石頭扔進水裏所激起的漣漪那樣，是由中心向四周一圈一圈均勻地漸次擴大的，而是有一定流向的。這一流向，是由信息自身與信息接受主體之間的關聯度決定的，是受接受主體對信息的興趣、偏好制約的。通過《知新報》的信息流動，人們可以看到，當年的上海與澳門，是風格相近、互有興趣的城市，是人員對流、信息對流廣泛而頻繁的城市；於是，形成了這兩個城市之間的如上所述的信息走廊。